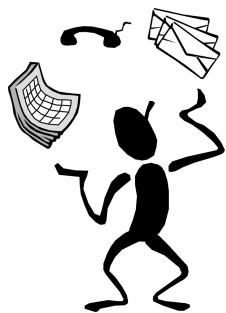


從移工的就業權益談家戶工作者之困境： 以我國與德國為例



張朝琴

摘要

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隨著社會發展因素，許多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流動。職業婦女的增加，使得許多傳統上由婦女操持的家戶工作出現勞動力的缺口，因此引進開發中國家的外籍家戶工作者來填補。外來勞工逐漸增加儼然是一個明顯的現象，而臺灣政府到民間思維，關於移工相關權益都還有待加強。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研究法，透過資料蒐集、整理、分析，比較我國與德國客工政策和制度，深入了解我國與德國移工家戶工作者的就業權益及工作困境。唯有透過立法，明確界定家務勞動者之勞動條件，訂立清楚的僱傭關係與責任，才能保障家務勞動者在法律上的地位，更甚至是免歧視之可能，讓這群遊走國家界線的家戶工作者，免於雇主的剝削與面臨職場危險，在生活上得到應有的尊嚴。

壹、前言

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臺灣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從開發中國家到新興工業國家，許多的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流動。由於社會發展因素，雙薪家庭逐漸成為普遍現象，職業婦女的增加，使得家事服務需求日增，同時面臨人口老化的挑戰，政府為促進婦女就業及高齡化社會的到來為由，自 1992 年開放引進廉價的外籍家務工，以做為填補龐大的社會需求。

根據勞委會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調查中得知，截至 2012 年 11 月為止，社福外籍勞工在臺總人數已高達約 201,726 人，其中看護工佔 199,572 人，家庭幫傭佔 2154 人，從外籍看護工的成長數字，透露出隨著家庭結構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家務勞動者投入家庭私領域的工作空間，政府透過引進看護工以解決我國在高齡化趨勢下，所面臨長期照護人力不足的問題（註 1）。

2003 年 2 月 7 日，前國策顧問劉俠遭印傭毆打，這件事情開始引發各界對於外籍監

護工的關注，聯合記者會上印傭維娜道出心聲，雖然劉俠待她很好，然而工作七個月以來，僅有一次外出打電話回印尼，其餘時間則是盡力工作、沒有休假，印傭維娜間接的道出成千上萬在台照顧重症患者的外籍監護工「不曾休假」的現象。這件事逐漸在社會上引起迴響，造成全台十數個外勞服務團體，開始持續推動立法，以維護外籍看護工之權益。

一般外籍看護工由於受雇於個別雇主，因此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成為法外孤兒，勞動權益不被保障，同時由於「家事服務」的特性，超時工作、全年無休往往十分稀鬆平常。由於長期照顧體系的落後與缺乏規劃，目前外籍看護工承擔照顧責任的重責，重症病人家庭與外籍監護工互相依恃的關係，使雙方都淪為結構的犧牲者，政府當務之急，即建構一個完善的勞動保障政策，回應外籍看護工嚴重被剝削之現象，使勞雇雙方都得以獲益。

臺灣海峽與柏林圍牆，都曾是冷戰時期分隔共黨鐵幕與西方世界的象徵，臺灣與德國，同樣面臨「國土分裂」的事實；但是，不同歷史條件的發展將其帶向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客工數目在我國還是少數，我國政策結構以及國際影響，也與德國大大不同。基於此，本文將先說明我國與德國移工政策的發展脈絡，接著將兩者作比較，採取文獻分析與比較研究法。探討家戶工作者之困境，期盼透過兩國移工之權益差異，作為回應家戶工作者困境之參考，以期未來政策改進之可能。

本文研究之名詞釋義：

一、移工（Migrant Workers）：先進國家與社會應經濟需求，自國外引進勞動力，國際上一般稱呼「Migrant worker」，直譯為「外勞」或「外籍勞工」。由於「外勞」多帶貶抑的意涵，因而國內勞工運動者與學者多以「移工」、「移往勞工」、「移徙勞工」稱之。

二、家戶工作者（household worker）：意指從外面被招募到家中展現再生產的工作者，她們藉由勞動力來賺取工資，所展現的是一種非常明確的雇主與工作者的關係，而不是上對下的主人與僕人的關係。

三、移工政策（Migrant workers policies）：即本文之客工政策，政府透過制定、管理或限制等手段，達到實踐移工引入的相關政策。

四、移工權益（migrants' rights）：在臺灣，移駐勞工（migrant worker）依白領、藍領各有不同的法令規範。一般官方及民間所稱的「外籍勞工」，特指工作於工廠、營造工地、家庭、養護機構、漁船的藍領移工；由於其總數高達三十餘萬，相關政策也屢屢引發移工集結抗爭。故本文所稱之「移工權益」，專指藍領移工來臺後的處境。

貳、臺灣的移工制度

一、臺灣移工制度政策背景

1992 年我國開放引進外勞。主導外勞引進政策及管理制建立的勞委會從一開始堅持不開放引進外勞，到最後在壓力下政策轉

向，這是政商妥協與因應反對聲浪的結果。從開放製造業、營造業移工，到外籍看護及家庭幫傭，外籍勞工的人數不斷成長。隨著國內產業結構轉變，產業因大陸市場優勢而外移，使國內就業市場職缺快速流失，失業率升高，基層勞工受外勞引進的影響最大，特別是原住民勞動人口首當其衝（註 2）。於是原本立意填補產業缺工的移工們，便被國內勞工視為失業的禍首。

1999 年時制定「入出國及移民法」，2000 年修訂「國籍法」全文 23 條（初次制定為 1929 年），這兩個法律的制定，使我國的移民政策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宣示政府關注到在臺外籍居留者的存在與權益保障的需要。2000 年政黨輪替後，扁政府為實踐競選承諾（每年減少 15,000 外勞的引進），推動緊縮外勞政策。但因效果並不如預期：國內失業率並未因此改善，特別在營造業的部份，國內營建業勞工並未因外籍移工的減少而獲得工作，以 8% 遠高於行業別平均失業率。政府原想藉由緊縮移工刺激產業轉型的企圖，因中國崛起而成效不彰。（註 3）

2004 年後，時逢全球景氣回溫，扁政府藉此一契機，重新放寬移工政策，且有鑑於國內少子化與人口老化的趨勢，照顧服務業在國內體系尚未完備前，仍有繼續引進外籍看護工之需求。勞委會與職訓局分別委外研究緊縮外勞政策利弊後，有意鬆動引進移工的限制。2005 年謝長廷轉任行政院長後，要求檢討移工政策，為避免傳統產業沒落，重大工程無法動工。於是勞委會宣布調降傳產的移工申請門檻，並將重大公共工程禁用移工的限制解禁。

針對移工的政策發展，曾熾芬（2004）即以國族主義的政治與重商特性，分析政府在外勞政策上所展現的管制偏好與不一致性。（註 4）且臺灣政府長期以來強調本身為「非移民國家」（註 5），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採行防堵移民的排除性「客工制度」，對於非法外籍勞工皆嚴格查緝。可見在臺灣，經由政府在層層法規中對於「我們」與「他們」的精緻分類、「排除異己」及階級區分的設計下，除了婚姻移民外，其他管道的移民，特別是移工，入籍的機會成功的被防堵了。

二、臺灣移工之權益

在長期、永久居留及歸化入籍方面，對於非技術或低技術的藍領外勞（目前幾乎皆來自東南亞國家），國、民兩黨政府在政策上皆以防止變相移民及逃跑外勞的心態對應，採取技術性排除外勞正式成為臺灣社會中新移民的機會。罔顧外籍勞工基本人權及限制其行使社會權的不合理規定而對僱主而言，每隔幾年就必須重新招募、訓練、適應也相當浪費成本。

對於家庭團聚權及移工居留要件已有改進。例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外國人來台依親及已有擔保者，解除禁止入國之限制。第 25 條第 8 項但書規定，因投資、受聘僱工作、就學或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而依親者，解除配額（由主管機關衡量國家利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外人申請我國居留或永久居留之配額，並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限制。第 31 條第 4 項第 6 款規定，外國人

與本國雇主發生勞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程序者，得准予繼續居留。均屬符合國際社會保障家庭團聚權及移徙勞工權益之進步作法。而對僱主而言，每隔幾年就必須重新招募、訓練、適應也相當浪費成本。另對於申請永久居留者，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1 項第 3 款保留原有的財力或技能證明條款。（註 6）

防止外籍人士非法工作，依舊是管理制度上主要的項目：在保障本國勞工及合法移工的權益為原則下，緊縮外勞政策，同時加強查緝非法雇用移工，以及加重非法外勞、僱主及仲介的罰則。非法勞工的問題並不因政府宣示重視人權的修法而有改善。

我國自 1992 年正式引進家事移工，政策性以廉價私有化市場來解決個別家庭的照護需求，以作為社會福利漏洞的急救箱。同時，因「失能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照顧服務計畫」規定，已聘請看護者，即不得接受居家照顧服務的社福挹注，致使家事移工因無替手而幾無喘息。如今，在臺家事移工已逾 20 萬人，而其常年無休的奴工處境，也備受國際批評，指臺灣嚴重違反人權指標。（註 7）

參、德國的移工制度

一、德國移工制度政策背景

德國的移工制度，在歷史上相當有名，又稱為「客工制度」。所謂的「客工」（Gastarbeiter），顯示國家因現實需求，願意引進外國勞動力，卻不希望這些客工長期居留或者成為移民（註 8）。欲瞭解德國「客工制度」的歷史脈絡，首先回溯至第二次世

界大戰，當時德國慘敗與冷戰開始，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歐洲重建計畫），馬歇爾計畫成功地透過經濟援助，刺激歐洲對戰後重建的投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西歐英荷法等重要國家，為經濟重建及彌補戰時損失之人力，開始積極引進外籍勞工，實行客工制度。

第二次大戰期間，德納粹使用大量戰敗國的奴工及佔領區的俘虜，扶植重工業之發展，1948 年又有來自東德其他蘇俄附屬國家的難民，提供內部勞動力，因此相較這些國家，西德較晚引進外籍勞工者。1950 年德國因人口結構改變及固定匯率制度吸引外資繼續投資，致使勞動力不足，德國資本家開始向政府提出外籍勞工的要求，並威脅出走，然而德國工會強烈反對外籍勞工的引進，經由多次協商，以及德國官方保障由國家介入招募外勞程序（當時負責處理此業務的為聯邦就業服務局，聯邦就業局於輸入國設立招募辦事處，透過各種測試及紀錄調查，以團體非個人方式引進，並由雇主負擔食宿安排），同時保證擁有與本國勞工同工同酬之待遇（德國為聯合國及歐洲聯盟會員之一，德國工會會有此舉動，乃受聯合國下的國際勞工組織影響，此組織於 1949 年呼籲對待移工要同工不同酬）。1955 年，德國陸續自義大利、西班牙、希臘、土耳其、葡萄牙、匈牙利等國引進外籍勞工。（註 9）

二、德國移工之權益

1957 年的羅馬條約近乎建立歐洲聯盟之雛型，條約中說明：開放會員國之物品、人、服務、資本的自由流動，德國深受影響，擁

有許多附近國籍之移工，當時的義大利客工，已享有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的市民權及失業補助、兒童照顧等的社會權，與德國正式公民相較，義籍客工僅無法享有選舉權。客工取得工作證後得以進入德國工作，原本客工制度之建立，是不希望客工長期居留，因此剛開始居留時間為一年，然而顧及資本家利益及客工欲賺更多錢供給家人的立場，截至 1960 年德國外國人口倍增，經濟的重責大任逐漸轉移至客工身上，1968 年因應國際工約與規範，同時受利益團體的爭取，德國政府延長客工的居留時間，同時客工經聘雇一年後，在固定收入及房舍的前提下，得以申請家庭團聚，1973 年德國因石油危機，實施門戶緊閉政策，同時為平息國內逐漸升高的種族衝突，不在輸入客工，德國客工政策終於結束。（註 10）

肆、我國與德國移工就業權益之比較

在不同的歷史背景，我國和德國對外籍勞動者皆採行「客工制度」，而非長期居留式的移工政策，政策中的某些關鍵因素，影響甚至改變移工未來發展可能。茲將分別以兩國移工之基本權益保障、工作待遇（涵蓋工時、休假、薪資、退休及撫卹）、相關福利等各層面作為相互比較。

一、就基本權益保障層面而言

德國客工政策原強調外籍勞動者之客人地位，然受國際組織的倡議，致使德國政府轉而支持移工自由流動權益、社會福利與家

庭團聚權利，資本家與工會等社會交互作用，則形成另一股推力，致使德國的客工成為了長期居留者。臺灣自退出聯合國後，唯一參加帶有官方色彩的國際性組織即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然於移工議題上，客工被要求不得轉換雇主，除非有重大受難事實，移工的居留權與雇主的聘僱許可綁在一起，在在顯示欠缺社會性與人權考量，因此上述德國客工的基本權益，在臺灣相關政策上卻不見蹤跡。

二、就工作待遇層面而言

德國應工會要求，保證擁有與本國勞工同工同酬之待遇。對臺灣的移工而言，工作待遇依循工作類別而有所劃分。若為營造業與製造業移工，則受勞動基準法保障，因此移工之工時、休假及薪資保障上，至少擁有最低基本工資、一定的工作時數及休假，而監護工與幫傭等家庭類勞工，則被排除在外，因此舉凡工作時間、勞動條件、勞僱雙方的權利義務，都沒有任何法規得以規範及保障。

三、就相關福利層面而言

德國移工與一般公民相較，僅無選舉權，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的市民權及失業補助、兒童照顧等的社會權，卻相當豐厚。之於臺灣移工僅能擁有勞工保險與健康保險，卻無退休與失業給付，可以說是相當有限的社會福利。

四、就社會經濟背景而言

我國與德國在各自所屬世界區塊，各有其不同的產業發展脈絡。在一九八〇年代之

前，移工的現象還沒在亞洲國家間發生；但是在西歐，移工已經是戰後重建與經濟復甦的重要生力軍。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得德國與臺灣需求廉價勞工以挽回出走的資本家；來自民間社會的作用、社會視聽以及來自工會的回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Sassen (2002) 提出超國家組織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與去國家主義 (Denationalized)，言國際組織將以人權政權之姿 (Human rights regime) 形塑一個新的政治身分界定，使得客工一步步取得政治權利成為可能 (註 11)。然而超國際法律架構所支撐之生產與流通的全球化，取代了民族國家法律結構的有效性；民族國家還是可以發揮發意識形態的壓迫性 (註 12)。端詳德國移工政策之歷史脈絡，政策中處處可見國際組織影響之蹤跡，客工成了移工，在德國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臺灣則成為政策制定者極力要避免的現象 (註 13)。然而對從居留時間的一延再延，從三年、六年陸續延長到九年，種種跡象都顯示；奴工式的客工，將來極有可能成為「長期居留的客工」。在德國，家庭團聚成為一個重要的由「工」成為「民」的關鍵。然而在我國，家庭團聚議題的提出必須要有一些基礎，「取消客工居留限制」並「允許客工可以自由轉換雇主」，將可能成為臺灣客工現象從短期居留到長期居留的轉戾點。

我國與德國都強調自己是非移民國家。客工只是為了國家經濟的產物，扮演廉價、彈性的角色，以迎合市場競爭的需要；客工，同是被視為是「他者」，沒有成為公民的機會。

伍、家戶工作者的工作困境

分析家戶工作者的生活困境前，應先給予「家戶工作者」明確之定義。「家戶工作者」意指從外面被招募到家戶中去展現再生產的工作者，她們藉由勞動力來賺取工資，所展現的是一種非常明確的雇主與工作者的關係，而不是上對下的主人與僕人的關係，欲釐清其與雇主的關係，因此以「家戶工作者」(household worker) 一詞來取代一般臺灣人所習稱的「女傭」，或者是學者所稱呼的「家務工作者」(註 14)。林映竹認為「家務工作者」涵蓋家庭幫傭及家庭監護工 (註 15)。職是之故，「家戶工作者」藉由勞動力賺取工資，展現一種雇主與工作者之平等關係，工作性質概括有家庭幫傭與家庭監護工。

我國自 1992 年正式引進家事移工 (即本文的家戶工作者) 後，政策性以廉價私有化市場解決個別家庭的照顧需求，以作為社會福利漏洞的急救箱，然而因失能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照顧服務計畫」規定，若以聘請看護者，即無法受居家照顧服務的社福挹注，致使家事移工無替手而幾無喘息餘地。繼 2003 年劉俠遭印傭毆打，陸續傳出外籍幫傭砍殺雇主的事件，大家對於外籍家戶工作者開始「社會問題化」，卻忽略掉事件背後的意義「全年無休的工作」。(註 16)

外籍家戶工作者來台工作前，需給付高額仲介費，得以購買「監護工」一職，然而工作並沒有想像中的單純，面臨重重困境如下：

一、法令地位弱勢，間接影響自主性

研究者請家戶工作者 Weny 敘說日常生

活實踐，她談到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拿到工作流程表後開始工作，從打掃、洗車、到紡織廠工作，直至晚上吃完飯，照顧行動不便的阿嬤就寢才得以休息。顯現「家事服務」的特性，影響家戶工作者內容。雖然依法與雇主制定契約，然而制定內容含糊，也無明確制定上下班時間及超時加班的計算方式，導致家戶工作者嚴重剝削，如同林津如認為：這些外籍家戶工作者的工作經驗顯示，從踏入雇主家門口的那一刻起，種種措施都在鞏固一個有層級之分的雇傭關係。這不均衡層級關係建立在外籍工作者在法令地位上的弱勢，而雇主則在此基礎上施展權力，管制外籍家務勞動者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工作內容、工作時間、薪資、住宿及進食方式的安排。這樣的優位訊息、管制及規則越多，工作者的自主性越少。（註 17）

二、雇傭關係夾雜階級、種族的壓迫

海外工作大幅地提高了勞工的經濟所得，但從事的家務工作普遍被視為只要低技術程度的職業。Rhacel Parrenas（2001）稱這種情況為「矛盾的階級流動」（contradictory class mobility），雖然出國工作帶來薪資收入上的增加，從事低技術、汙名化的家務工作，卻同時帶來社會的向下流動。（註 18）遷移勞工所經驗的羞辱感覺，不只是因為家庭幫傭這項職業的汙名，更因為地主國的種族歧視（註 19）。這群來自東南亞的婦女被引進臺灣擔任家戶工作者，與雇主的關係並非一般的勞雇關係而是呈現上對下的主僕關係。許多雇主甚至因為「擔心外勞學壞」所以不讓他休假，或是與朋友聯絡，或是限制家用

電話使用，因此造成大部分的家戶工作者失去行動自由。更因為臺灣經濟優勢的自大，歧視來自東南亞經濟弱勢的外籍勞工，使得家庭中的雇傭關係，夾雜階級與種族的壓迫。（註 20）

三、公、私領域合而為一，易面臨危艱的工作場域

外籍家戶工作者居住於雇主家，當雇傭場域既是公領域又同時是私領域，家戶工作者處在這私密的雇主空間中，容易遭受性騷擾或性侵害等危險，家庭私密空間的特性成為勞動者的隱憂。大部分家戶工作者多選擇自力救濟的方式面對，例如穿長褲、或以言語和武器嚇阻，大多選擇隱忍面對，獨自承受不愉快的經驗或壓力。外籍家戶工作者選擇屈就，反應藉由種種的歧視與高昂的仲介剝削下，家戶工作者「主體選擇」的能力是相當有限而艱難的。（註 21）

概括的說，家戶工作者受限於勞動契約的不確定，致使面臨長工時，無休假之剝削，國家政策體制更間接造成結構性壓迫，致使家戶工作者面臨危機時，僅能自力救濟。

陸、結論與建議

全球化對勞動市場所造成的衝擊，不僅單就勞資關係而已，勞動者的工作條件及權益也在這一波浪潮中逐漸式微，從家戶工作者的困境，我們發現這些契約移工作為欲求的勞動力而得以進入國家的地理疆界，但卻受被拒絕轉化為公民，被排除在國家的象徵性界線以外。外籍家戶工作者不具公民身分

的資格，強化了不平等的勞雇關係，更無組織工會的權力，面臨長工時、沒有週休、耗費心力的照護工作，以及雇主的諸種控制等。這些家務勞動者在欠缺法制保障，低劣勞動條件下造成的身心煎熬，容易讓勞僱雙方淪為制度下的受害者。

當跨國的勞動力流動變得愈來愈加頻繁，隨之而來的國家主權也面臨許多挑戰，透過比較臺灣與德國客工制度之差異，發現國家角色決定移工政策之主要關鍵，官方介入招募，降低高額仲介費的可能，同時制定相關法律，維護移工勞動人權，對於移工的人權侵犯，不能單純歸因於雇主或仲介的不仁不義，而是政策體制的結構性壓迫。唯有透過立法的基礎，明確界定家務勞動者之勞動條件，訂立清楚的僱傭關係與責任，保障家務勞動者在法律上的地位，促進勞動條件的權力拉近，更甚至是免歧視之可能，讓這群遊走國家界線的家戶工作者，免於雇主的剝削、面臨職場危險，在生活上得到應有的尊嚴。

德國對於保障移工權益，於我國現行措施有何啓示：在德國，家庭團聚成為一個重要的由「工」成為「民」的關鍵。

近幾年來，我國民間團體倡議取消客工的居留年限，但是尚未提及家庭團聚的主

張。研究者認為，在臺灣現實條件，家庭團聚議題的提出必須要有一些基礎。取消客工居留限制並且允許客工可以自由轉換雇主，將是促使臺灣客工現象從短期居留到長期居留的關鍵點。也唯有在此條件下，客工比較像是一個社會中的份子，成為所謂移工，得以開始掙脫被限錮於僱傭關係的社會網絡，當客工重新取回自己經濟與私空間的談判籌碼時，進而客工的家庭團聚權之討論才有更具體的推進。相對的，我國政策制定者與社會，也有必要認識到國際移工權益的潮流，重新思考移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位置。

我國要落實民主深及人權立國等原則，正視非公民的外國居民，作為臺灣社會有機組成的一部份，尤其是居於階級與族群弱勢的外國人。至於未來公民身分、移民政策的辯論中，我們應慎重考慮提供移工永久居留、入籍歸化，或是家庭團聚管道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透過新的政治論述與制度框架，來對非公民的永久居留，合法住民的權益，作擴充性的保障。

（本文作者為私立玄奘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關鍵詞：移工、家戶工作者、移工政策、移工權益

註釋

註 1：行政院勞委會，2012.11。

註 2：林如昕，2009：75「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

註 3：1999 年時制定「入出國及移民法」，2000 年修訂「國籍法」全文 23 條（初次制定為 1929 年）。

註 4：曾嬾芬，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頁 1-58。

註 5：龔尤倩，客工制度安魂曲？由臺灣與德國客工政策的比較談起，頁 8

註 6：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25 條第 8 項但書第 31 條第 4 項第 6 款等規定、及第 25 條第 1 項第 3 款保留原有的財力或技能證明條款。

註 7：失能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照顧服務計畫。

註 8：余健慈，全球化浪潮下國際移民對移入社會之影響——比較德國與臺灣當前移工/移民政策與其影響。

註 9：同前註。

註 10：龔尤倩，前揭文，頁 9。

註 11：同前註，頁 10

註 12：Hardt-Negri，2002:429

註 13：龔尤倩，前揭文，頁 11-12。

註 14：林秀麗，私領域裡的勞動力買賣與危機——從臺中地區菲籍家戶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實踐談起，頁 200-212。

註 15：林映竹，外籍家庭工作者勞動條件與身心健康之初探研究。

註 16：根據林秀麗（2003）之研究：關於「私領域裡的勞動力買賣與危機——從臺中地區菲籍家戶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實踐談起」，著重探究家戶工作者困境文章。

註 17：筆者個案研究訪談家戶工作者 Weny，請 Weny 敘說日常生活實踐，了解期生活適應情形.....。

註 18：Parrenas，Rhacel Salazar. *Servant of Globalization：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註 19：藍佩嘉，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頁 45-94。

註 20：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了臺灣新富家庭。

註 21：同前註。

參考文獻

入出國移民法

余健慈（2009.7）。全球化浪潮下國際移民對移入社會之影響——比較德國與臺灣當前移工/移民政策與其影響。論文發表於第三屆地方自治與民主發展:2009 年縣市長選舉與地方發展研討會。臺中: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林津如（2000）。「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93-151。

林秀麗（2003）。「私領域裡的勞動力買賣與危機——從臺中地區菲籍家戶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實踐

談起」。社區發展季刊，101，200-212。

國籍法

陳映竹（2006）。外籍家庭工作者勞動條件與身心健康之初探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曾熾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臺灣社會學刊，32，1-58。

鄭詩穎（2009.5）。「至高無上」的人權價值與「資源有限」的社會現實：「家事服務法」立法對臺灣照顧體制之成本分析初探。發表於第九屆臺灣社會福利學會年會。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藍佩嘉（2002）。跨越國界的生命地圖：菲籍家務移工的流動與認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8，45-94。

藍佩嘉（2009）。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了臺灣新富家庭。臺北市：行人。

龔尤倩（2006.10）。客工制度安魂曲？由臺灣與德國客工政策的比較談起。發表於第三屆「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顧玉玲（2011）。全年無休家奴制 就地合法？2011-03-08 中國時報 社論—包容、尊重讓移工看見臺灣的人權價值 2012-10-20 01:50 中國時報。

Antonio, Neigri and Michael Hardt 李尚遠譯（2002）。帝國。臺北市：商周。

Parrenas, Rhacel Salazar. (2001) *Servan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d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